

中国经典宝库



周礼

远古的理想

冯绍霆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经典宝库



周礼

远古的理想

冯绍霆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丛书由原出版者香港中华书局合法授权予本社出版

中国经典宝库

周礼：远古的理想

冯绍霆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092 1/32 插页5 印张7.75 字数157,000

1997年8月 第1版 1997年8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8,000

ISBN 7-5325-2266-0

B·278 定价：11.50元

主 编 的 话

十三经对今天的不少年轻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,可是在古代这却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。汉代开始,由于儒家地位的提高,那些最能代表儒家精神的典籍,便被尊为经典,经过唐、宋两代的补充,便形成了以《诗》(《诗经》)、《书》(《尚书》)、《易》(《周易》)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等为内容的十三经。这十三种经典虽然都属于儒家的早期著作,但是由于它们代表着儒家核心的思想观点和文化结晶,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,其生命力却历久弥新。这些特点是:

一、历史悠久。十三经中多数著作的确切撰著或成书时代无法考定,可大致能够肯定的是均出现于周代至秦汉之间,时间距今都是两千年以上了。这是中国用文字记载的典籍中早期成果的精华,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。今人想要溯流追源,那是定要阅读十三经的。

二、内容丰富。十三经的内容各有侧重,有对自然现象的观察,有对社会秩序的叙述,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载,有对民间文学的汇编,有对历史人物言行的实录,可以说汇含了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,其涵盖面是极为宽广的。

三、影响巨大。两千多年来,中国读书人都将十三经作为治学、立身、处世的思想知识渊藪来看待,它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准则,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、所有角落,它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哲学观、政治观、道德观、伦理观、文学观、历史观、宗法观、价值观等等观念,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,渗入到中国国民的血液中,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。

有人曾说,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的载体,主要是由十三经、诸子百家著述、二十四史和一些优秀文学著作组成的,这话很有道理。我们今天所讲的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主要也是指从上述各类典籍中汲取精华,去除糟粕。这些典籍特别是十三经,实在是一座座无尽的宝藏,足以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助益:

一、思想道德的资助。十三经所包容的思想道德观念广博而深刻,它的“天人合一”的世界观,能够启发人们很好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,从而适应并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。它以尧、舜、文、武为楷模,主张德治和仁政,崇尚礼乐和仁义,倡导民本思想。在伦理道德上注重“五常”(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),借以维护社会秩序,处理人际关系。在自我修养上则主张磨炼人格意识,坚定言行操守,“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,“匹夫不可夺

志”，进而提出了一整套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规范。举凡传统儒家的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经济、文化等观点，无不融汇其中。而且，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，历经汉、宋、明、清各代儒生的笺注解释，这种儒家思想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发展，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，上自皇室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大都以此作为规范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。因此，十三经堪称传统文化的宝库。

二、历史知识的丰富。十三经中各经的成书时代有先有后，著述时间跨越数百年；而所记述内容的时域又包容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兼及秦汉，长达两千余年。在这漫长历史期间的朝代更迭、帝王轮替、礼仪典章、战争攻伐、辞说外交、学术争鸣、文学创作、文物器具等等，无不在十三经中有所记载。通过这些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可靠史料，我们可以认识那数千年历史的概貌，知道我们民族之所由来。同时，它所形成的典故，也供给我们广博的知识。

三、语言文字的培养。用古代语文著述的十三经，固然因其简古而索解为难，韩愈说《尚书》是：“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诘屈聱牙”（《进学解》）；不过，十三经中却也有专门关于文字知识的一经——《尔雅》，它围绕着其他典籍对古文字作了解释，使我们得以了解有关字词的古义，读懂其他各经，并了解汉字的由来和演变。更何况，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当时就被视为学习语言的教科书，孔子曾说过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它所建造的美文学殿堂，给历代的文学发展以滋养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虽属史书，却也是文字简洁、气势磅礴的古

代优秀散文。《孟子》一书记载了孟轲及其弟子们的谈话，可它所表现的思辨与逻辑力量简直是无与伦比的，而且简明通俗、亲切动人，确为美轮美奂的散文。阅读十三经，当会增加我们的语言文字知识和增强文字表达能力。

十三经自是一座开掘不尽的文化宝藏，它必将裨助中国新文化的健康发展。而《中国经典宝库》对这座宝藏作了初步的介绍，以供深入宝藏的朋友们做点前期准备。还望读书界的朋友提出批评性意见。

魏同贤

乙亥新春于沪寓

前 言

提起乌托邦,提起太阳城,提起这一类西方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,东方人并不陌生。那末,我们东方自己呢?生活在亚洲东部、拥有绵延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,有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充满想象力、饱含着对美好生活激情的作品呢?这些作品是不是也像西方同类作品那样广为流传,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呢?

答案毋庸置疑:有。《周礼》就是一部。只要稍具文史常识,就知道《周礼》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,与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并称三礼,且为三礼之首。它所阐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。需要注意的是,《周礼》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,并不等于说那完全是作者的空想。实际上,《周礼》中还包含了若干周代的史料。既有史实的成分,又有理想的成分,两相掺杂,固然使这部书留下了更多的疑团,无可否认,但同时也使这部书生出更明亮的光辉。“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”,孔子的话提醒我们,周代的制度是儒家心目中的典范,名之以

“周”的礼仪将会成为后世的楷模。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，环绕着《周礼》的神圣光环是难以消除的。

翻开《周礼》，可以发现，全书分《天官》、《地官》、《春官》、《夏官》、《秋官》、《冬官》六篇，几乎每篇都以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数语起首。以下，在《天官》则说“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治，以佐王均邦国”，先总述天官一系自大宰以下六十二种职官的名称、职级、属员数额等编制情况，再分叙各种官职的职掌范围。如大宰就为六卿之首，百官之长，天下政务由他掌理，以辅佐王者统治天下。《地官》的体例与之相同，在“乃立地官司徒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教，以佐王安扰邦国”数语之后，同样先总述地官司徒以下七十九种职官的编制情况，再分叙各官职掌。《春官》、《夏官》、《秋官》各篇都是如此，五篇中一共说明了五大系列三百四十余种官职的情况。这些官职除个别的，如《地官》中的司禄、《夏官》中的军司马、舆司马等十数条阙失外，其余的讲得都很具体。他们的执掌范围，上至国家的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司法、祭祀等重要事务，下至地方行政，甚至包括了直接管理平民百姓生产生活的，可以说，《周礼》以大量的篇幅，通过官制介绍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，系统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情况。这个社会由各式各样的制度控制着人的行动，显得很有秩序，各人的负担也很均衡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气氛。

《冬官》一篇，情况有些特殊，它实际是一篇《考工记》。《考工记》不以“惟王建国”数语开首，开宗明义即称：“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居一焉。”说明主要讲述百工之事，

所记内容为先秦时期官营手工业中的三十个工种，即“攻木之工七、攻金之工六、攻皮之工五、设色之工五、刮摩之工五、搏埴之工二”的概要情况，包括各工种的工艺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方法。由于手工业生产不光是一个加工制造的问题，它还要涉及原料的选择、产品的设计思想等等，所以《冬官》的内容必然会涉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。有人讲，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成先秦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一个总结，这当然不是过誉之词。

读者可能会问，这样两种差异很明显的材料，怎么会出现在同一本书里呢？这需从《周礼》被发现的经过说起。

《周礼》名曰“周”，实际上在西汉以前并不为人所知。先秦诸子议论周代礼制的不在少数，却没有一人明确提到过有这么一部书。直到西汉初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，又鼓励献书，一些为免遭焚毁而藏诸山崖屋壁的先秦古文旧书这才开始露面。据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记载，献王曾得到过李氏所献的一批古文书，其中就包括《周礼》，当时还称为《周官》。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，薨于武帝元光五年，此书初次露面当在这二十余年。这时，已缺《冬官》一篇，献王以重金悬赏，终不可得。之后，这部《周官》被收入皇家秘阁，重又度其不为人知的岁月。百年时光流逝，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皇家藏书，直到此时，它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。这次，刘歆即以《考工记》补足已经亡佚的《冬官》，凑满了《周官》六篇的数量。他这样做，似乎也有道理。按《周官》本身而言，其中如《天官》篇大宰、小宰诸条所载，亡佚的《冬官》篇包含着有

关百工之事的内容，讲手工业工艺的《考工记》显然与之有联系。从思想上说，《周官》全书浸透了阴阳五行思想，而《考工记》同样如此。内容相关连，思想又一致，刘歆所为或许事出有因。甚至有人推测，《考工记》原本是为写作《冬官》而作的一篇札记。果真如此，则以《考工记》补《冬官》更顺理成章了。只是，从体例上看，两者的差异太明显了。

刘歆整理了《周官》，现在所见的，大致就是这个本子。他还奏请将它列之于经，并定名为《周礼》。可以说，没有刘歆，就没有今天所知道的《周礼》。然而，诸多纠葛也由此而起。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《周礼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。

尽管《周礼》本身没有提到它论述的是何朝何代的典章制度，更没有“周公若曰”之类言辞，但是刘歆却认定，它是“周公之太平之迹”。东汉初，刘歆的学生杜子春设席授业，传《周礼》之学，一时歆学大盛，众多鸿儒竞相为《周礼》作解诂。至东汉末，经学大师郑玄博采众家之说，作《周礼注》，认为《周礼》就是周公为周成王所制官政之法。由于郑玄在经学界的声望，《周礼》为周公手作之说为后世学者所宗。然而这个结论实在漏洞太多，《周礼》中所述制度与西周政制不相吻合的不胜枚举。周初封国，无有过百里的，而《周礼》中却称“诸公之地，封疆方五百里……诸侯之地，封疆方四百里”，令人吃惊。因此到了历史科学发达的今天，周公作《周礼》之说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。

关于《周礼》作者的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刘歆伪造

说。此说始倡于宋人，代表人物为胡安国、胡宏父子。胡宏认为，刘歆伪造《周礼》是为了“附会王莽，变乱旧章，残贼本宗，以趋荣利”。《周礼》是古文经，在群经中出现最晚，又无传授，发现经过也人言人殊，尤其是刘歆在其间所起作用，并非丝毫无可怀疑。今文学家认为此书来历不明，不能说完全是宗派之见。然而，汉初民间所献之书不是绝无仅有的少数几部，秦火劫余，要一一指明其端绪，事实上也难以办到。仅凭此一条，断言为刘歆伪作，多少感觉牵强。更何况，这场争论中除了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外，还夹杂着政治斗争的背景。胡氏父子力主刘歆伪造，目的之一就是反对王安石援引《周礼》作变法的依据。学术问题，又加上政治问题，不纠缠成乱麻一团，才是咄咄怪事。

除了以上两说，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《周礼》成书年代的各自看法。有的认为《周礼》所述什九是西周旧制，当是东迁以后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，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，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。有的则认为从《周礼》所显示的伦理思想、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，此书当作于西周末的厉王、宣王、幽王时代。也有的学者从全书的思想体系着手，认为它的主体思想由儒、法、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，呈现“多元一体”的特点，故而《周礼》当成书于汉初高祖、文帝之际。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战国说。自东汉经师何休提出《周礼》为“六国阴谋之书”的观点以后，历代都有人景从其说。至近代，此说赞同者越来越多。清儒崔述《丰镐考信录》、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，近代学者钱穆先生《周官

著作年代考》、郭沫若先生《周官质疑》、顾颉刚先生《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》、范文澜先生《经学讲演录》等等，均持此说。然而，学术上的争论，向来不依赞同者的多寡为是非的标准。关于《周礼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探讨，必定还会长久持续下去，直至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为止。

那么，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耗费如许精力孜孜以求呢？为的是《周礼》太富于研究价值了。

概而言之，《周礼》的价值主要有二。一是它包含了周代的史料。以后世人的眼光，可能难以理解《周礼》所述的官职系列中何以会有专管饮食、衣服之类琐事的。殊不知，这恰恰是当时真实情况的记载。身处当今之世而欲考求古代中国的实况，诸如古代的田制、兵制、学制、刑法、祀典诸大端，《周礼》是可以提供给人们许多帮助的。

再有就是它对后世的影响。王莽变法、王安石变法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大事件，而这两件事，恰恰都规摹了《周礼》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曾经席卷大半中国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所制订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被誉为中国农民的理想最集中的体现。而这部《天朝田亩制度》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，又正是《周礼》。甚至在今天，当我们漫步北京城，站在天安门前观赏景色时，东边可以看到曾经是太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，西边有设有社稷坛的中山公园，又有谁会想到，这种宫殿居中、左边祖庙、右边社稷的格局，正是《周礼》的规定。要想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的历史，读一读《周礼》是大有益处的。

问题在于怎么读。

《周礼》文繁事富，许多词汇语法现代人难以理解。上文提到过地官司徒“佐王安扰邦国”一语，一般人都会把“扰”字同乱字连在一起，作扰乱解。而在这里，“扰”字偏偏与“安”字同义，含有使人驯顺的意思。一部《周礼》、此类情况不少，欲破此关，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，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最基本的三种：一、郑玄《周礼注》，二、贾公彦《周礼注疏》，三、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。郑玄的注实际上为《周礼》学作了第一次总结，简奥融通，功力最深，为学习研究《周礼》必读之书。贾公彦疏成于唐初，它是阐释郑注的，实际上已经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包括在内，故而是《周礼》学的第二次总结。孙诒让正义成于清末。他根据宋元明清历代学者的研究，疏通证明，折衷最为恰当，在清人新疏当中没有超过此书的。在目前，也可以说孙氏正义是《周礼》学的最后一次总结。如能将这三种基本参考材料理清，则《周礼》也就基本上掌握住了。

在读这些注疏时，它们的体例是必须了解的。宋代以前，注和疏是分别印行的，至宋代才把注疏合刻成一部书。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周礼注疏》流传很广，研读者经常使用。书中大字都是《周礼》正文，大字下面双行夹排的小字是郑玄的注。接着又有一个大字〔疏〕，则表明以下为贾公彦的疏。这些疏文以小圆圈相间隔，小圆圈前都有“某某至某某”数字，如果它们指的是大字中的文字，则圆圈后的疏文是解释正文的；如果它们指的是小字中的文字，则疏文是对郑玄注的说明。

《周礼正义》的内容排列次序是：《周礼》正文，郑玄注，一个大字“疏”，对正文的疏，空一格，“注云”，以下为对注文的疏。也就是说，“正义”同贾公彦疏一样，不但要解释正文，而且要给前人的注作注解。理不清这个头绪，这一类注疏是很难读通的。

读注疏书时还应当注意注释术语的用法。下面将郑玄《周礼注》中常用的一些术语简介如下，其余注家的可以以此类推。

（一）单纯解释词义的：

某，某也。或者作：某者、某也；某，某；某者，某；某，言某也。这些注释的基本格式，意思是某一词应当解释为另一词。

谓之、曰、为。约略等于现在经常说的“叫作”，被解释的词往往放在这些术语之后，说明词则在前。

犹。约略与现代汉语的“等于说”相当，用来表示释者与被释者为同义或近义关系。

谓。使用“谓”字时，被释的词语在前面，“谓”字后面是解释。

貌。含有“……的样子”之意。

（二）与读音有关的：

之言、之为言。它们都是声训术语，解释者与被解释者或者是同音，或者是双声、叠韵等某种语音上的联系，一般用以解释词源。

读为、读曰。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的。

读如、读若。一般用于注音，所谓“比拟其音”，有时也用本字来说明伪借字。

(三)指明误字或版本异同的:

当为。指出因形或声相近而发生的字、声之误。

书、故书。它们都指的是不同的版本。

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,就是借助了上述几种基本参考材料,并参阅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草成的。篇幅有限,也由于笔者水平有限,这本小册子难以把整部《周礼》作全面、详尽的介绍,只能选择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若干问题,谈谈笔者的看法。这些问题分成五个类别:第一类是《周礼》作者有关理想社会总体框架的构想,以下四类分别是《周礼》作者有关如何管理政府机构和官吏、如何治理百姓、如何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设想,以及主要是体现在《考工记》中的一些科学思想,或者说科学思想的萌芽。按所涉及问题的不同,每一类中还分成若干小节,各节都由《周礼》原文、今译和述评三部分组成。《周礼》原文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《周礼注疏》转录。个别文字同其他版本有出入,又比较紧要者,疑为衍字、误字者,均加注说明。为了方便阅读,笔者试对原文作了标点,主要依据的是黄侃先生对《周礼》的句读,以及林尹、闻人军诸先生的著述。如有错讹,当由笔者负责。《周礼》中不乏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述散见各篇的例证,为了述评方便,将散见各处的原文纳于同一节中,所以一节之中可能包含两段以上的原文。今译,笔者力求忠实于原文,尽可能直译。为了使读者能理解《周礼》作者时代的一些特殊语汇,理解《周礼》作者的一些设想,译文中糅合郑玄、贾公彦等所作的注疏,作了些说明。

这样做，大概还是必要的。述评，当然要叙述《周礼》作者表达了什么想法，更希望指明，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，对于今天的我们又可能有甚么样的启迪。

写作时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金良年先生提供了许多意见和资料，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完成极有帮助，在此深表谢忱。

笔者学力未逮，疏漏之处必多。高明有所指正，则不胜感激。